

中国古代彩色夹缬源流考略

田伟, 李加林, 冯光

摘要: 以中国古代手工印染技艺中的夹缬为研究对象, 运用染织服饰史的研究方法, 围绕中国古代彩色夹缬的起源、传播与演变, 对相关文献及文物资料进行分析论证。研究表明, 夹缬唐代起源说依据的史料存在失实, 彩色夹缬的发明不晚于初唐时期。盛唐时期夹缬技艺十分兴盛, 中晚唐至宋代, 夹缬遍布大江南北, 官宦、庶人皆服。宋代以后夹缬逐渐衰微, 到了明代基本在民间失传。

关键词: 彩色夹缬; 夹缬起源; 夹缬传播; 工艺考略; 手工印染

引用本文格式 田伟, 李加林, 冯光. 中国古代彩色夹缬源流考略 [J]. 创意设计源, 2024(1):23-29.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olor Jiaxie in Ancient China

TIAN Wei, LI Jialin, FENG Guang

Abstract: Taking the Jiaxie in the ancient Chinese handmade printing and dyeing technolog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history of dyeing and weaving costumes, focusing on the origin, dissemin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olor Jiaxie, analyzing and argu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relics data.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historical data on which the origin of Jiaxie in the Tang Dynasty is based are inaccurate. The invention of the color Jiaxie is not later tha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art of Jiaxie was very prosperous, and from the middle to late Tang Dynasty to Song Dynasty, the Jiaxie was spread all over the north and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officials, eunuchs, and common people were wearing the Jiaxie. After the Song Dynasty, the art gradually declined and was basically lost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color Jiaxie; origin of Jiaxie; the spread of Jiaxie; process research; handmade printing and dyeing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文化润疆视角下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视觉再现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 22XJJC860001); 2024 年度新疆理工大学校级一般项目“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新疆段染缬技艺的源流考略与数字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 SY202410) 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唐代, 夹缬十分受文人雅士的欢迎。比如,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玩半开花赠皇甫郎中》: “紫蜡黏为带, 红苏点作蕤。成都新夹缬, 梁汉碎胭脂。”《泛太湖书寄微之》: “黄夹缬林寒有叶, 碧琉璃水净无风。”又有《裴常侍以题蔷薇架十八韵见示因广为三十韵以和之》: “合罗排堪缬, 醉晕浅深妆。”^① 唐代的夹缬与佛教有一定关联, 因此常被用于制作佛幡、褥垫、典礼舞乐的衣物等, 甚至能够在敦煌莫高窟佛像的服饰(见图 1)、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壁画

风。比如, 日本正仓院的麟鹿草木夹缬屏风(见图 2), 宛如中国画一般的印染技艺, 即便时隔 1 000 多年, 仍保持着淡雅的文人画气息。

夹缬工艺在隋唐时期开始盛行^[1], 夹缬研究则起步较晚, 虽然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斐然, 但仍存在不清晰的地方。日本正仓院精美的夹缬屏风让日、韩研究者热衷于复原古代夹缬工艺。20 世纪末, 浙南夹缬被媒体报道后, 在我国掀起一股“夹缬热”。虽然 20 多年来, 夹缬研究论述庞杂, 但依然有很多从业人员在夹缬起源、传播和演变的认识上存在诸多误解^[2]。比如, 一些



图 1 中唐敦煌第 159 窟比丘菩萨像



图 2 麟鹿草木夹缬屏风

研究者认为夹缬起源于天宝或宝应年间，一些研究者在论述中将浙南夹缬与古代夹缬混为一谈，甚至将夹缬称为“夹染蓝印花布”。事实上，浙南夹缬与古代夹缬在工艺上差别很大，其与日本的板缔染倒是有不少工艺上的相似之处，甚至有必要重新思考和商榷浙南夹缬到底是恢复和延续了唐代的夹缬，还是另有其他更为直接的工艺渊源^[2]。至于夹缬和蓝印花布，在印染工艺原理上便存在差异，将两者相混无疑是张冠李戴。针对以上现象，文章对古代夹缬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爬梳剔抉，理清彩色夹缬起源、传播与演变的过程，希望为古代夹缬的源流呈现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彩色夹缬起源诸说与存疑点

目前学界对彩色夹缬的起源尚存争议，主要有隋代起源说和唐代起源说两种认识。赵丰^[3]、郑巨欣^[4]认为《因话录》《唐语林》等文献对夹缬起源的描述有名有姓，让人信服。且从出土夹缬实物来看，尚未发现盛唐以前的实例。张道一等^[5]认为夹缬在唐代曾辉煌一时，宋代走向式微，到了近代，夹缬染色的独特技艺已失传成谜。张琴^[6]猜测夹缬可能起源于印度，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卫艺林^[7]等认为，唐代开元、天宝、宝应年间只是盛行夹缬，而非起源时间，唐代起源说在真实性和客观性上存疑，夹缬隋代起源说具备相当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事实上，缺少对夹缬起源问题的集中讨论，的确使夹缬在民间造成一定的误解。

（一）夹缬天宝起源说存疑

笔者在温州调查时发现，一些从业者认为夹缬是玄宗天宝年间柳婕妤之妹赵氏所发明，主要依据是南宋王说在

《唐语林》^③中的描述：“玄宗柳婕妤有才学，上甚重之。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8]¹⁴⁰⁵ 研究者认为，唐代有大量夹缬的文字记载和实物为凭，且目前隋代未有可靠的夹缬实物出土，因此认为《唐语林》中所言的时间、人物以及具体发生的情况言之凿凿，很难不相信这是事实^[4]²²⁻²⁵（见图3）。但夹缬唐代起源说依据的史料只是轶事小说，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失实。《唐语林》中记载：“玄宗在人间，闻娇陈之名，及召入宫……娇陈乃以睦州女弟对。乃选入充婕妤，生延王及永穆公主焉。”但《唐会要》卷六记载了开元十年（722年）永穆公主出嫁一事：“开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敕有司优厚发遣，依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谏曰：‘高宗末年，唯一一女，所以殊其礼。又太平骄僭，竟以得罪，不应引以为例。’上纳其言。”永穆公主是玄宗的长女，虽然生卒年不详，但玄宗四女唐昌公主的生年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唐

昌公主生于713年，而李隆基712年8月才登基。由此可知，永穆公主生于玄宗登基以前，娇陈入宫及柳婕妤嫁给玄宗之事存在时间悖论，此时李隆基还只是临淄王，王氏也还只是王妃，故而献缬事件可能为后人杜撰。但即便记载有失真之处，柳婕妤嫁给玄宗的时间，与献王皇后夹缬之事并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全盘否定《唐语林》中关于夹缬之事的记载。若《唐语林》中关于“赵氏献缬”的记载为真，那么“献缬事件”一定先于王皇后被废的724年之前，且此时王皇后的地位还十分稳固。夹缬工艺是自下而上由民间走入宫廷，如果工艺未成熟到一定阶段，是不可能被献入宫中的。这种古代传统手工艺的成熟周期短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从玄宗即位到王皇后失势不过十余年，这么短的周期夹缬不可能从无到有，发展出复杂精美的彩色夹缬工艺。综上所述，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的夹缬由唐玄宗时期柳婕妤妹赵氏发明之说值得商榷。

除了《唐语林》外，北宋高承的《事物记原》^④也时常被研究者所征引。“事始曰：夹缬微子造。二仪宝录曰：秦汉间有之，不知何人造。陈梁间贵贱通服之。潘氏记闻谭曰：唐代宗宝应二年，吴皇后将合祔（合葬）肃宗陵启墓（旧）堂衣服缬（厚帛）彩如撮染成花鸟之状。玄宗柳婕妤妹适赵氏性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打为夹缬。初献皇后一匹，代宗赏之，勒宫中依样制造。当时甚秘，后渐出，遍天下。此似始为夹缬之制也。”^[9]（见图4）。按照高承的说法，夹缬起源有多种可能：（1）夹缬是由名为微子的人发明。（2）秦汉时期已有夹缬，但不知是谁发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贵人和庶民都穿夹缬。（3）依据潘远《纪闻谭》的说法，唐代宗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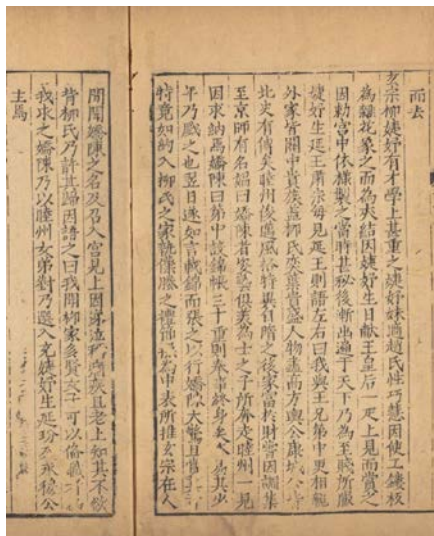


图3 《唐语林》卷四《贤媛》

应二年（763年）让宫中依据玄宗时期柳婕妤所献夹缬的样式进行了仿制。虽然高承的描述较为模糊，但可以推断出几点认识：其一，在高承所处的北宋时期，关于夹缬之事多是民间故事传说，人们已不知夹缬发明创造的契机。由此可见，南宋王谠的《唐语林》对夹缬起源的描述应只是依据一些传说或想象。有学者称《唐语林》中夹缬之事引证的是晚唐赵璘的《因话录》^⑤，但《因话录》中并无夹缬之事的相关记载。其二，前两种说法引据的史料现已无从考据，在纺织考古中也未有发现予以佐证。但《直斋书录解題》^⑥之二收录有《纪闻谭》三卷。依据五代时期《纪闻谭》的说法，吴皇后被准以先太后的礼仪合葬陵庙，人们在打开棺椁时发现皇后身着的衣服有撮染花鸟的纹样。“撮”为聚合之意，一般指代绞缬手法，但花鸟是十分具象之物，且根据前后文可以推断

此处的“舊（旧）堂衣服”所用工艺手法应是彩色夹缬。吴皇后在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祔葬建陵，去世是在公元730年。因此，在公元730年以前，五彩夹缬工艺必然十分成熟。若“初献皇后”指代的是前文的吴皇后，那么“代宗赏之”便可能是唐代宗见到生母所穿的夹缬衣服时勒令宫中依样制造。代宗即位后打开春明门外生母的旧墓，吴氏容貌像活着的时候一样，粉黛如故。她所穿夹缬服饰在唐代佛教中应用十分广泛，而代宗极为信佛，有了这层奇异色彩，夹缬“后渐出，遍天下”似乎也说得通。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事物纪原》中的皇后和《唐语林》中的王皇后是同一人^{[5]61}。若是献缬的对象是王皇后，那么“代宗赏之”本身就不可能发生，因为代宗时并未有王姓皇后。能解释的便是《事物纪原》存在笔误，此处并非“代宗赏之”。

（二）夹缬的传播范围与起源考略

通过夹缬的传播范围、工艺的成熟程度可以推断彩色夹缬并非起源唐玄宗时期。唐代冯贽《云仙杂记》卷一中引《叙闻录》载：“郭元振落梅妆阁，有婢数十人。客至，则拖鸳鸯衣颌裙衫，一曲终，则赏以糖鸡卵，明其声也。宴罢，散九和握香。”郑巨欣认为“鸳鸯衣颌”指夹缬^{[4]28}。郭元振是在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入仕，713年坐罪流放，抑郁而终。若记载为实，那么初唐时期夹缬便在当时的社会形成一定的传播范围。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记载了天宝六载（747年）安禄山献俘入京，玄宗赐“夹颌罗顶额织成锦帘二领”，《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吐鲁番出土文字·市司牒上郡台曹司》有“夹绿绉壹尺”的记载，鉴定年代为743年，《吐鲁番

出土文书》第八册《阿斯塔那一九三号墓文书·天宝年间行馆承点器物帐》有“夹缬被子”的记载，文书为天宝八载（749年），可见天宝时期，夹缬在西北地区的贵族阶级中蔚然成风。另外，敦煌莫高窟第45窟盛唐时期的中尊佛坐像、第194窟菩萨像、第159窟比丘菩萨像、第9窟女供养人，以及克孜尔石窟第8窟左甬道外侧壁的龟兹供养人、第17窟服饰纹样上表现了夹缬的一些特征。

自唐以后夹缬传入日本，唐宋时期中日贸易频繁。因此，可结合日本相关资料对夹缬起源及演变进行分析论证。日本正仓院所藏夹缬有一部分为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的制品。图5是唐代的散乐浑脱半臂，裙裾为紫地唐花纹夹缬罗。笔者发现，这件服饰的右衽内部用墨书写着“东大寺唐散乐混脱天（残缺）胜宝（墨迹不清）四（月）九”（见图6）。另一件是演奏吴乐时的服饰，为茶地花纹夹缬罗。其上用墨书写有“大佛开眼会用物”，和散乐浑脱半臂一样，是东大寺天平胜宝四年（752年）四月九日大佛开眼会的用品^[10]。这些在东大寺大佛开眼会、圣武天皇一周年忌日的法事中使用的佛幡、舞乐服饰、褥垫等，在仪式后奉纳给东大寺，之后作为正仓院宝物流传至今。这两件服饰上的古代墨书十分罕见，为判定夹缬传播到日本的时间提供了依据。大佛开眼会正是第九次遣唐使前往中国的时间，因此，这批衣物应是前一次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在此事件之前，最近一次遣唐使返回日本的时间是736年。因此，夹缬传入日本的时间应不晚于736年，处于唐玄宗开元时期。

通过前文对夹缬的文献与实物资料的考略，笔者发现唐代起源说存在诸多疏漏，初唐时期彩色夹缬工艺已成熟，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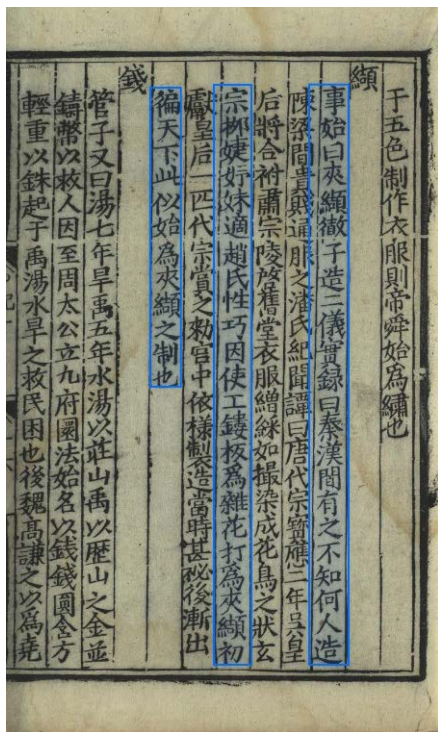


图4 高承《事物纪原》



图5 唐散乐浑脱半臂 第4号



图6 浑脱半臂局部有古代墨书

播范围甚广。彩色夹缬应该在唐玄宗即位之前便已产生，单色夹缬可能出现得更早，在隋代，甚至是隋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发明。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⑦记载：“隋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宫人及百僚母妻，又制单丝罗，以为花笼裙，常侍宴供奉宫人所服。后又于裙上剪丝凤缀于缝上，取象古之褙翟。至开元中犹有制焉。”^{[11]20} 此处是史料中第一次提及五色夹缬，蜡缬、灰缬一般不用罗来印染，绞缬不会染制五色，此处时间、地点、人物和工艺描述得十分具体，较前文提及的宋代文献可信度更高，时间更早。其中赐“宫人及百僚母妻”，说明夹缬的贵重以及产量、品控均达到一定标准，“至开元中犹有制焉”也和玄宗时期夹缬兴盛的情况相符。隋大业时期虞世南撰写的《北堂书抄》载：“万道盛北疆记云，芦生南郊着皂斑褶绣袴。”在宋代，“皂斑缬”指代夹缬，可以考虑“皂斑”一词是隋代夹缬名称的一种，在后世仍有沿用。《历代三宝记》^⑧卷十二记载，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令国人崇佛之事，诏书中有一

句“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明代学者陆深据此认定，这是雕版印刷的“印书之始”。这里的“雕撰”虽没有明确说是用于印染佛像的雕版，但紧接着又有“敬施一切毁废经像绢十二万匹”，此处雕撰的是否可能为夹缬印制经像绢所需的雕版？隋代崇佛需要印染大批经像绢、佛幡等佛教用品，这也能解释彩色夹缬发明的契机。虽然一些学者认为隋代未遗存具有说服力的夹缬实物，但隋代仅存38年，墓葬节俭，缺少实物佐证似乎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在隋及隋以前的古代墓葬中也出土过一些具有夹缬特征的印染品。20世纪80年代在青海都兰出土的魏晋时期“散点花朵蓝白蜡缬绛”据称是由凸纹版印制完成蜡防纹样。它所表现的一些特征说明早在魏晋时期，或许已采用雕版夹印技术，印法与夹缬相仿，成为后来真正夹缬出现的契机^{[4]19}。田自秉以吐鲁番出土的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天蓝色绢地夹缬”举证，认为夹缬不只唐代始有，从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丝织品来看，在南北朝末期就有遗物可考^{[12]155}。卞宗舜在论述隋唐时期的印染时也曾提到

新疆于田出土北魏时期的“夹缬印花绢”^{[13]206}。可见夹缬隋代起源也有一些文物资料可以佐证。

在探讨夹缬起源问题时必须认识到，一项工艺的诞生、传播不是一蹴而就，必定面临着工艺改进、品控优化和量产等问题，而这些都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积累与沉淀。若非如此，夹缬技艺自发产生的命题便值得商榷。有观点认为夹缬技艺传播可能与隋大业五年征伐吐谷浑有关^[14]。近年来，印度、西藏地区也发现夹缬遗存。新疆是亚洲大陆的中心，这一地理优势使新疆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过渡地带^[15]，吐谷浑恰巧联系着中原与漠北、南疆、西藏高原等地，这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还有待后续研究。目前来看，夹缬的产生、传播与演变还存在许多未明之处，迫切需要中、日、印三国学者通力合作，在多国史料、文物研究中冲出封闭沉积的研究范畴，建立起跨文化研究的宽广视域，促进学科研究的深化。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如下认识：（1）夹缬唐代起源说的相关史料失实，彩色夹缬最晚在初唐时期已被发明，天宝、宝应起源均无可能。（2）隋代夹缬可能同雕版印刷术一同被发明应用，夹缬隋代起源说更具合理性。（3）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蜡缬夹印、灰缬夹印的“夹缬”可能是彩色夹缬工艺的发端，为唐代夹缬工艺的隆盛做了工艺上的探索和铺垫。

二、彩色夹缬的传播与演变

（一）唐宋：彩色夹缬的兴盛与限制

从相关文献及目前遗存的实物资料可以发现，盛唐以后是彩色夹缬的兴盛时期，宋代夹缬才逐渐衰微。中晚唐至五代，夹缬遍布大江南北，贵族、庶人、僧

人都有穿着夹缬的例子。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十七上记载：“庚子（828年）敕：应诸道进奉内库，四节及降诞进奉金花银器并纂组文缬杂物，并折充铤银及绫绢。”此处“文缬”指具象图案的印染品，唐代灰缬并未有较大发展，因而“文缬”应该指夹缬。北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一杂录记载：“大和三年（830年），客女奴婢通服青碧听用庶人兼许夹缬。”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记载：“王起判度支，太和四年十月，进绫绢夹缬杂采等共一万四千三百疋，御衣一副，镜一面诸方镇称是。”由此可知，中唐夹缬的产量较大，且夹缬已渗透至庶民的日用服饰中。唐代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任判官施夹缬肚一一疋，辛长史见来，便交裁作褐衫。斋后出州，归到宿处。”^{[16]188}时间是会昌五年（845年），圆仁此时停留在郑州。唐末王定保的《唐摭言》卷十二：“王璘举日试万言科，崔詹事观察湖南，因遗之夹缬数匹。璘翌日以中单襜褕衣之以诣，崔公接之大惊矣。”^{[17]141}此事件发生在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年）的湖南地区。南宋王应麟的《玉海》卷八十二载：“韦绶为学士，德宗幸其院，以蜀缬袍覆而去。”韦绶是唐德宗时期的翰林学士，此处提及了“蜀缬袍”。自唐以来，夹缬在四川地区便有生产，这一点体现在白居易的诗中：“成都新夹缬，梁汉碎胭脂”，这蜀缬袍也具有夹缬的可能性。

唐代以后，夹缬一词在文献中较少出现。晚唐至五代还可在吐鲁番文书中找到夹缬的记载，到了宋辽时期，几乎已不见夹缬之名。这并不代表宋代夹缬衰微，此时，夹缬往往以“缬绢”“缬罗”等较为笼统的词汇出现，一些新式

缬名也被认为是夹缬。如北宋陶谷《清异录》卷下记载了五代时期名为“尊重缬”的新样式。“显德中，创行尊重缬、淡墨体、花深黄。工部郎陈昌达好缘饰，家贫，货琴剑，作缬帐一具”。此事件发生在后周时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由于爱好，当时的穷书生把琴和剑典卖换做新式缬帐^[18]。郑巨欣认为“尊重缬”是夹缬的可能性较大^{[4]39}。《宋史·舆服一》中有“缬绢对花凤袍、緋缬绢对花宽袖袄”，这里的“对花”是夹缬的工艺特征。《宋史·仪卫一》记载有“宜男缬罗单衫”“白狮子缬罗单衫”，宜男草、狮子类纹样都十分具象，用绞缬手法难以表现，而灰缬蜡缬无以罗为印花的先例，因此，郑巨欣认为两者都是夹缬^{[4]41}。《宋史·舆服五》记载有“七年，禁民间服销金及钹遮那缬”“是年，又禁民间服皂班缬衣”“政和二年，诏后苑造缬帛。盖自元丰初，置为行军之号，又为卫士之衣，以辨奸诈，遂禁止民间打造。令开封府申严其禁，客旅不许兴贩缬板”。此处的“钹遮那缬”有诸多理解，沈从文认为是一种加金的印染工艺，而刘道广^{[5]32}和郑巨欣^{[4]84}认为“钹遮那缬”并非指印金织物，而是于阗语的音译，具有夹缬的可能性。从前文禁止民间兴贩缬板来看，“钹遮那缬”“皂班缬”应该都指代夹缬。

宋代一方面将锦绣换成缬罗，另一方面夹缬的民间生产遭到一定限制。《宋史·舆服一》记载：“靖康之末，累朝法物，沦没于金。中兴，掇拾散逸，参酌时宜，务从省约。凡服用锦绣，皆易以缬、以罗。”《宋史·仪卫三》记载：“用锦绣、金银、真珠、北珠者七百八十人，以头帽、银带、缬罗衫代。”靖康之乱后，朝廷厉行节俭，将锦绣更换成夹缬。夹缬的相关记载反映了宋王

朝的衰退和对奢荡靡极的反思。因战争原因，服饰由锦绣置换成夹缬，民间缬板贩卖遭禁，夹缬行业因此受到打击。但从其他史料可以发现，民间夹缬贸易并未因此一蹶不振。《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记载了朱熹弹劾唐仲友的事件：“又趁势造花版印染斑缬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这侧面印证了官府虽明令禁止，但夹缬仍有销路。《梦粱录》谈临安市容时，提到诸多彩帛铺，所谓彩帛，便是印花缬帛^[18]。虽然官府在民间禁止制作缬板，但屡令不止，临安街头印花缬帛的店铺林立，成为一道风景。

（二）元明：彩色夹缬式微与消散

宋代以后，彩色夹缬逐渐式微，文物和史料都比较稀少，这可能与夹缬易名有关。在元代，夹缬技艺本身趋于单色化，一种新的趋势正在形成。《元史》中记载：“衮衣，用青罗夹制，……裳一，带褙褙全，红罗八幅夹造。上绣藻、粉米、黼、黻，藻三十二，粉米十六，黼三十二，黻三十二。蔽膝一，带褙褙，红罗夹造八幅，上绣升龙二。”此处的“青罗夹制”“红罗八幅夹造”侧面说明了夹缬技艺曾用于加工帝王的礼服，且色彩可能较为单一。《丹铅总录》记载：“元时染工有夹缬之名。”而元末明初的《碎金》中归入夹缬里的一些缬名。比如，浆水缬明显已不是夹缬，且面料可能已由丝绸转为棉布，更像是现代的蓝印花布。明代杨慎的《李卓吾先生读升菴集》^⑨载：“胡元时染工有夹缬之名，别有檀缬、蜀缬、浆水缬、三套缬、缘丝班缬诸名，问之今时机坊亦不知也。”可见，到了明清时期，夹缬工艺在民间已经基本失传。虽然在发掘明代定陵时出土了“八宝纹夹缬绢”、故宫博物院也珍藏有几幅明代夹缬，但这些彩色夹缬和西藏地区的夹缬较为类

似,很可能来自西藏^[19]。

彩色夹缬在元明时期逐渐消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宋以后夹缬的名称不断发生变化,经过宋、辽、夏、金、元多民族的交流已经变得有些混乱^{[4]35},名称的变化反映了技艺内部的演变,从出土夹缬文物的加工方式上也能得到这点认识。其二,受政治、文化、审美方式的影响,宋时起禁止民间贩卖缬板,客观上阻碍了夹缬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的迭代。此外,战争也导致部分彩色夹缬工艺的失传。文化与审美上,元代色尚蓝白,蒙古族有“苍狼白鹿”的祖先传说,“由于色尚蓝、白,令大批蓝色、白色的工艺品应运而生。宫廷仪典中大批使用蓝色、白色的纱罗绫缎”^[20]。青花瓷器与蓝印花布形成“双壁”便是这种蓝白审美的体现。此外,元代统治阶级喜好织金锦一类的豪华织物,有晕染痕迹且色泽不明亮的夹缬并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审美,在改朝易代后自然被统治阶级抛弃。其三,出自技术与原材料的革新。在民间,因黄道婆推广棉纺织技术,棉织物耐碱不耐酸,且棉织物分子链中有很多羟基,吸水性强,十分消耗染料。相对其他植物染料,靛蓝更易制备,且印染棉布时色牢度相对较高。反之,用彩色植物染料去染棉布色牢度低,因此到了明清时期,无论是在宫廷还是民间,彩色夹缬都失去了消费群体。

五、结语

彩色夹缬是中国古代印染技术与文化的一个缩影,其起源、传播、演变的历史对实证我国古代高度发达的手工印染技艺具有特殊意义。同时,彩色夹缬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在起源与传播问题上,文章对两种夹缬起源说,以及以往容易被忽视

的文献问题进行了再研究,明确了目前唐代起源说在文献上存在失实之处。在唐代开元时期夹缬已广泛传播,日本正仓院所藏便是证明。从史料和工艺的发展规律上看,夹缬应在隋代或初唐时期已被发明,盛唐至唐末社会传播面十分广泛。到了宋辽时期,夹缬的名称发生了变化,且在民间的生产遭禁。从名称变化及出土文物来看,这项工艺似乎发生了转变。元代尚有夹缬之名,但工艺由多色转向单色,明清时期彩色夹缬近乎绝迹。通过上述问题的探讨,基本可以对中国古代彩色夹缬的起源、传播与演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注释

① 20世纪70年代,武敏在《唐代的夹版印花——夹缬——吐鲁番出土印花丝织物的再研究》一文中认为“合罗排勘缬”是对夹缬工艺的写实记叙:“罗指筛罗花版。合罗,是将两页相同的筛罗花版相对叠合,把织物夹在中间;排勘缬,即依次移动这两页花版,版版衔接,印出美丽的花纹。”

② 笔者认为在夹缬研究中存在不少知识更新不及时的情况,一些相关论述并未对文献的时间、事件以及前后文之间的联系做出细致的考究,只是断章取义地引用片段导致不少以讹传讹的现象。

③ 国内多数传统工艺从业者的理论知识相对薄弱,《唐语林》中的“唐”字便会让很多人产生误读。虽然《四库全书总目》称:“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认为《唐语林》具有一定可信度,但其为轶事小说,若以其为“金字招牌”便会形成一种遮蔽。

④ [北宋]高承:《事物纪原》明万曆刻本十卷第十一册第18页,藏于柏克

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事物纪原》是宋代高承撰写的类书,在内容上《唐语林》虽考证全面,但仍是轶事小说,且与《事物纪原》相似度极高,用以互证夹缬起源于唐代缺乏说服力。

⑤ 笔者查阅《因话录》,只找到柳婕妤嫁给玄宗的缘由,并未有夹缬之事的任何记载。此外,赵璘和柳氏宗族有血缘关系,其直接目的是为宗族扬名,对柳氏宗族的描述有美化成分。

⑥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言:“蜀潘远撰。”《馆阁书目》按李淑作潘遗。今考《邯郸书目》亦作潘远,其曰“遗”者,本误也。所记隋、唐遗事。”

⑦ 此书以考证名物制度为主,体例与晋代崔豹的《古今注》大致相同。

⑧ 隋开皇十七年(597年)费长房撰。又作开皇三宝录、开皇录、三宝录、长房录、房录,收录于大正藏第四十九册,是佛教传入我国后至隋代的弘法记录。

⑨ 明杨慎撰,明李贽辑并评,明末刻本,藏于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文中引用记载于第二十卷《缬衣》。

参考文献

- [1] 李雪艳. 蓝夹缬工艺及其现状: 浙江乐清蓝夹缬工艺调研 [J]. 创意设计源, 2015(3):55-59.
- [2] 郑巨欣. 日本夹缬的源流、保存及研究考略 [J]. 新美术, 2015,36(4):44-49.
- [3] 赵丰. 夹缬 [J]. 丝绸, 1991(增刊1):98-100.
- [4] 郑巨欣. 浙南夹缬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
- [5] 汉学编辑室. 夹缬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6] 张琴. 各美与共生: 中日夹缬比较研究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7] 卫艺林, 梅蓉. 夹缬工艺的起源新考 [J].

纺织科技进展,2017(10):9-12.

[8] 王说. 唐语林校证 [M]. 周勋初, 校证.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9] 田伟. 中日夹缬比较与设计研究 [D]. 杭州: 浙江理工大学, 2023.

[10] 田伟. 风从东方来: 古代夹缬东传与日本板缔染研究 [J].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2):13-17.

[11] 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12] 田自秉. 中国工艺美术史 (修订本)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13] 卞宗舜, 周旭. 中国工艺美术史 (第

2版) [M]. 杭州: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

[14] 梅蓉, 卫艺林. 夹缬隋代起源说考略 [J]. 纺织科技进展, 2018(3):52-54;59.

[15] 包文瑞. 追本溯源: 汉代丝绸之路沿线文化的传播路径 [J]. 创意设计源, 2023(3): 55-58;64.

[16] 圆仁. 入唐求法巡礼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7] 王定保. 唐摭言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8] 沈从文. 谈染缬: 蓝底白印花布的历史发展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9):13-15.

[19] 郑巨欣, 石塚广. 夹染彩缬出: 夹

缬的中日研究 [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7.

[20] 尚刚. 大汗时代: 元朝工艺美术的特质与风貌 [J]. 新美术, 2013,34(4):64-71.

田伟, 冯光

新疆理工学院

李加林

浙江理工大学

(上接 17 页)

造节庆 IP 人格、拓展 IP 体验渠道的设计路径, 为其打造独特的旅游 IP 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路。这不仅保护与创新当地传统文化、助力南岗千年瑶寨旅游经济的发展, 也能为同类型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研究虽缺少实践维度的探索, 但本文确实填补了南岗千年瑶寨旅游 IP 探索的空白, 为其旅游发展提供了见解。希望在后续研究中, 研究者能够就南岗千年瑶寨进行旅游 IP 设计实践, 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为南岗千年瑶寨旅游 IP 的构建进行全面探索。

参考文献

[1] 张岩, 李景平. IP 开发热颠覆我国文化产品经营传统模式 [J]. 青年记者, 2016(35):92-93.

[2] 陈凤娣. 文化 IP 赋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思考 [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5):29-38.

[3] 孙荣垆. 传统村落旅游开发模式演变: 以南岗古排“复兴”为例 [J]. 广西

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2(1):100-106.

[4] 李英梅. 新时期博物馆保护与传承非遗的路径探析 [J]. 创意设计源, 2023(4):25-27.

[5] 曾韬. 民族村寨旅游价值引导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J]. 学术研究, 2022(2):98-104.

[6] 盘小梅, 汪鲸. 边界与纽带: 社区、家园遗产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 以广东连南南岗千年瑶寨为例 [J]. 广西民族研究, 2017(2):111-117.

[7] 唐子豪, 茹裕聪. 从明清地方志看北海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J]. 创意设计源, 2022(3):15-19.

[8] 王桂忠, 王剑兰, 杨玲. 粤北瑶族长鼓舞的艺术特质与现代价值探析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0(3):79-82.

[9] 田志梅, 周亚男. 传统村落文旅 IP 形象设计研究: 以江西吉安渼陂古村为例 [J]. 创意设计源, 2023(3):17-21;26.

[10] 中国旅游研究院, 驴妈妈旅游网. 中

国旅游业创新和 IP 发展报告 (2020-2021) [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22:85-90;117.

[11] 杨振之, 邹积艺. 旅游的“符号化”与符号化旅游: 对旅游及旅游开发的符号学审视 [J]. 旅游学刊, 2006(5):75-79.

[12] 张凌浩. 产品的语意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21;67.

[13] 广东省人民政府. 清远千年瑶寨文化造新节助力乡村振兴 [EB/OL]. (2021-11-12)[2024-01-05]https://www.gd.gov.cn/zwgk/zdlyxxgkzl/fpgzxx/content/post_3643448.html

[14] 何佳. 艺术人类学视角下民艺功能的重构途径探讨 [J]. 创意设计源, 2019(3):35-39.

黄景茵, 张晓刚, 李易苍

广东工业大学